

後現代戰爭理論及其批判

陳文政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

「後現代戰爭」(postmodern war) 理論不是單一理論，而是多個不同稱呼但有類似指涉的理論之總成。後現代戰爭的理論歷經約 20 年的發展演進，學者與實務界除以後現代戰爭稱呼外，¹也有以「資訊時代戰爭」(information warfare) 為名，²而後改稱為「網絡中心戰」(network-centric warfare)，³亦有以「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RMA) 來形容此時期的革命性轉變，⁴也有「虛擬戰爭」(virtual war) 的極端講法，⁵也有逕稱為 (223) 「新類型戰爭」(new war)。⁶論者固可以用「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的角度去詮釋主流的後現代戰爭理論背後論述與政治權力間的明顯連結，但大部分的後現代戰爭理論的論理取向不僅與「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 或「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 等後現代主義理論無涉，甚至普遍帶有後現代主義者極力挑戰與反對的必然性 (determinism) 意涵。⁷在後現代戰爭理論裡，「後現代」一詞乃指特定的歷史條件，即所謂的後現代性 (post-modernity)，用以描述緊隨在現代性 (modernity) 之後的新的歷史時期，⁸在社會學論述中，現代性標誌著啟蒙時期以降歷經工業革命與殖民主義的時代，是社經條件大規模的世俗化、理性化、工業化、商品化、都市化、科層化、整體化的時代，而後現代性則指民族國家沒落、去殖民化過程、

¹ 如：Chris H. Gray, *Postmodern War: The New Politics of Conflict* (New York: Guilford, 1997).

² 如：Bruce Berkowitz, *The New Face of War: How War Will Be Fought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Zalmay M. Khalilzad and John P. White ed., *The Changing Role of Information in Warfare* (Santa Monica: RAND, 1999);

³ 如：USA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o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twork-Centric Warfare*, 2005.

⁴ 如：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 ed., *In Athena's Camp: Preparing for Confli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anta Monica: RAND, 1997); Richard O. Hundley, *Past Revolutions, Future Transformations: What can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 Tell Us about Transforming the U.S. Military?* (Santa Monica: RAND, 1999); Elinor C. Sloan, *The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Implications for Canada and NATO*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⁵ 如：James Der Derian, *Virtuous War: Mapping the Military-Industrial-Media-Entertainment Network* (Boulder: Westview, 2001); Michael Ignatieff, *Virtual War: Kosovo and Beyond* (London: Chatto & Windus, 2000).

⁶ 如：Mary Kaldor, *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Cambridge: Polity, 1999).

⁷ 後現代主義挑戰啟蒙時期以降的理性主義與科學進步的必然性，也挑戰理論的普遍性與客觀性。它們認為：理論或論述等知識離不開社會與政治權力的運作；事實是相對的，繫乎特定角度下所做的詮釋。在國際關係中，後現代主義相關理論要點可見：Richard Devetak, "Postmodernism," in Scott Burchill, Andrew Linklater, Richard Devetak, Jack Donnelly, Matthew Paterso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Jacqui True e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p. 162; 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4), pp. 30-31; Colin Hay, *Political Analysis: A Critical Analysi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pp. 26-27

⁸ Anthony Burke, "Postmodernism," 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59.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民族主義與宗教基本教義派的興起、文化的破碎等等的過程或現象，尤指資訊社會的來臨與其帶來的對既有社經條件之劇烈轉型。⁹同樣（224）的，後現代戰爭指的是當前的戰爭型態，通常以後冷戰時期為切割點，之前稱為現代戰爭，之後稱為後現代戰爭，並以波灣戰爭（Gulf War, 1991）——後冷戰時期第一場大規模戰爭——為典範。當然，對於戰爭——它的起因、遂行過程與影響，人文或社會科學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論體系。¹⁰不過，大多數的後現代戰爭理論多以戰爭型態（warfare）為主，包括戰爭本質（nature of war）與戰爭遂行的組織（organization）、準則（doctrine）與科技（technology）等四個面向。無論論者使用哪一種稱呼，他們的論點都顯示出相當的一致性：新的軍事科技帶動了後現代戰爭型態的成形，先驅論者Andrew F. Krepinevich在他著名的〈從騎兵到電腦：軍事革命的模式〉明白地指出這種因果關係：「新的科技應用於大量的軍事系統中，並結合創新的作戰概念與組織再造，以部隊戰鬥潛能與軍事效能上的急遽增加，來根本性改變衝突的特質與進行方式。」¹¹美國國防部在定義軍事事務革命時也沿用同一觀點：「歷史上，軍事事務革命發生於：新的科技結合作戰概念的革新與組織的調整後，一起整合進軍事系統中，並根本性地改變軍事作戰的特質與進行之時。」¹²換言之，後現代戰爭來自科技的驅動，而在戰爭本質、軍事組織、軍事準則上產生了有別以往的重大改變（如表一）。（225）

⁹ 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New York: Guilford, 1991), p. 4; 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York: Guilford, 1997), p. 29

¹⁰ 有關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或文化研究等學門（科）對於戰爭界定之比較可參見：Brain E. Fogarty, *War, Peace, and the Social Order* (Boulder: Westview, 2000), pp. 50-79.

¹¹ Andrew F. Krepinevich, "Cavalry to Computer: The Pattern of Military Revolutions," *National Interest*, No.37 (1994), p. 30.

¹² US DoD,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1995, p. 107.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表一：後現代戰爭理論主要論點

變化指標		現代戰爭	後現代戰爭
驅動力			
科 技	生產模式	工業化	資訊化
	武器產製	經濟動員、大量生產	軍工複合體、少量多款
	指標武器	火力載具	資訊載具
影響			
本 質	威脅來源	同類型的敵對國家	不對稱挑戰
	爭奪標的	領土、意識型態	意識型態、價值
	戰爭目標	擊敗敵人、佔領敵國	有限目標、危機控制
	社會態度	支持→敵視	敵視→漠視
組 織	政治考量	明顯區隔	優先或模糊
	組織特徵	層級分工嚴密	扁平化
	兵力結構	徵主募輔→募主徵輔	少數的高度專業化部隊
	軍隊組成	排除女性與私人組織	整合女性與私人組織
準 則	主戰兵力	地面部隊	航空部隊
	仿效對象	戰爭領導將領	戰鬥同儕
準 則	主要任務	國土防衛→協助盟邦	維和、反恐、人道救援
	作戰方式	摧毀敵人有生力量	點穴、斬首
	作戰方式	人員消耗→火力消耗	遠距精準打擊

來源：作者自繪

後現代戰爭理論不只是描述現象的理論而已，與大部分的戰略理論一樣，它很快成為推動國防軍事政策變革的智識工具，成為美國國防部推動「軍事轉型」（military transformation）的指導，也成為各國在仿效美軍變革時所一併接受。¹³ 因此，對於後現代戰爭理論的批判自然也成為對美軍變革之論述基礎與其他國家是否值得或可以加以仿效的質疑。在這些批判與質疑中，以下二個面向最值得留意：

後現代性的爭論 (226)

後現代戰爭理論引起的最大爭議在於後現代性的界定與分析上的時間依托點（analytical temporal bracket），兩者都與歷史見解有關，但前者涉及理論本身，衍生出傳統的克勞塞維茲派學者（Clausewitzian）對後現代戰爭理論的強烈質疑，爭議較大。

先論後者：後現代戰爭論者在分析上的時間依托點，亦即後現代性與現代性的時間分割點。就此，約有兩派講法（見圖一）：雖然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¹³ Elinor Sloan,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Warfare: A Reference Handbook* (Westport: Praeger, 2008), pp. 2-3, 52.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不是軍事專家，也不能說是此類爭論的先行者，但他們在1993年暢銷書《新戰爭論》（*War and Anti-War: Making Sense of Today's Global Chaos*）確實將後現代戰爭的論點提到普羅大眾面前，吸引更多戰略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相繼投入後現代戰爭的研究。他們認為生產要素的改變將使得戰爭的型態產生變化：「第一波的戰爭」約與農業時代相當，「第二波戰爭」約與工業時代相當，而目前方興未艾的以資訊為核心資源之第三波經濟型態，將產生所謂的「第三波戰爭」（the third wave warfare）的型態。¹⁴在此意義下，後現代戰爭即為資訊時代戰爭。工業革命始於18世紀中葉，因此把農業時代與工業時代在戰爭型態轉變的分界線劃在「拿破崙時代」是傳統的主流看法。¹⁵因此，第三波戰爭型態即在推翻拿破崙時代以降的第二波（227）工業時代戰爭型態。三波戰爭型態論者，持宏觀看法，強調社會整體（特別是財富獲得與累積方式）的革命。他們普遍認為工業革命催生了大規模的社會革命，使得農業時代舊有的缺乏裝備、組織的季節性戰爭與小規模軍隊面對面搏鬥的刀刀殺傷方式，轉變為工業時代的大規模軍備生產、嚴密組織的全面性戰爭與大規模軍隊遠距的槍砲殺傷方式。軍事事務革命約發生於法國大革命前後，拿破崙的戰爭型態是其代表。因此，要檢驗後現代戰爭型態的獨特性，必須把拿破崙時期以降的戰爭型態與當今後現代戰爭進行比較。

另一派持「第四代戰爭」（the fourth generation warfare）型態看法的學者，雖對後現代（也就是第四代）戰爭型態的起點無不同的看法，但它們把現代性戰爭型態的起點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¹⁶或更明確的1918年，¹⁷或戰後的1920、1930年代。¹⁸除此，也有部分學者認為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才是現代戰爭的開始；¹⁹或認為1939年是現代戰爭的頂點。²⁰四代戰爭型態論者，持微觀看法，強調戰爭方式（特別是作戰型態與武器發展）的革命。（228）他們特別強調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革命性影響，以及之後連帶產生的變化——包括了協同兵種作戰型態、閃擊戰思想的誕生、戰略轟炸、航空母艦作戰型態、無限制潛艦戰、兩棲登陸作戰與

¹⁴ 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Warner, 1993), chapter 8 and 9.

¹⁵ 例如：德國戰史家 Han Delbruck 把拿破崙時代視為現代戰爭的黎明，同時期的法國戰爭學院教官柯林 J. Colin 亦持相同看法，英國 Bernard Montgomery 元帥則更明確地指出1815年是現代戰爭開始，美國當代戰爭量化理論家杜皮 Trevor N. Dupuy 把戰爭型態分為「肌肉時代」、「火藥時代」與「科技轉變時代」三期，拿破崙時代的結束正是科技轉變時代的開始。分見：J. Coli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War*, Translated by Brevet-Major L. H. R. Pope-Hennessy (London: Hugh, 1912); Hans Delbru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ume IV: The Dawn of Modern Warfare*. Translated by Walter J. Renfroe, J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5); Trevor N. Dupuy, *The Evolution of Weapons and Warfare* (London: Jane's, 1980); Bernard Montgomery (Field-Marshal Viscount Montgomery of Alamein), *A History of Warfare* (London: Collins, 1968).

¹⁶ Williamson Murray, "Thinking about 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 *Joint Force Quarterly*, Summer, 1997.

¹⁷ Colin J. McInnes, *Men, Machines and Emergence of Modern Warfare, 1914-1945* (Surrey: Strategic and Combat Studies Institute, 1992).

¹⁸ 如：Robert J. Bunker, "Generations, Waves, and Epochs: Modes of Warfare and the RPMA," *Airpower Journal*, Spring, 1996.

¹⁹ 如：Ashley Brown, *Modern Warfare: From 1939 to Present Day* (London: Orbis, 1985).

²⁰ 如：Archer Jones, *The Art of War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87).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資訊戰思想與匿蹤科技的萌芽等等。因此，若要清楚後現代戰爭的獨特性，必須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降的戰爭型態與後現代戰爭進行比較。

	17世紀	18世紀	19世紀	20世紀前葉	當今
三波 戰爭 型態 論	第一波 戰爭型態		第二波 戰爭型態		第三波 戰爭型態
四代 戰爭 型態 論		第一代 戰爭型態	第二代 戰爭型態	第三代 戰爭型態	第四代 戰爭型態

■ 表示發生軍事事務革命

圖一：戰爭型態的分類

來源：陳文政、趙繼綸，《不完美的戰場：資訊時代的戰爭觀》（台北：時英，2001），頁40。

宏觀與微觀的觀點的不同也顯現兩派對於驅動後現代戰爭的起因之不同見解。持三波論，多為社會決定論，認為這些新的軍事科技、軍事準則與軍事組織是為了因應新的社會條件，也都反映出當時當地的社會背景。Toffler夫婦認為社會生產要素的改變使得戰爭的型態產生變化即為一例，又如歷史學家Jeremy Black把軍事事務革命的RMA縮寫置換並指出：軍事事務革命實肇因自「對軍隊態度革命」(Revolution in Attitudes towards the Military, RAM)，這些包括政治與社會環境改變，特別是後者，(229)當前的社會個人主義的抬頭與崇尚享樂，使得民眾無論在平時與戰時都對戰爭或軍隊不感興趣也不想參與。是這些社會條件的變化帶動後現代戰爭型態的產生。²¹二次大戰之後西方國家出生率普遍降低、小家庭盛行，使得社會對於戰場傷亡的異常敏感。過去那種戰爭必然的大規模傷亡，對於現今西方社會來說是很難接受的事。²²Michael Howard甚至說：「社會越進步，越多人認為戰爭是野蠻而不是什麼英雄式的事。」²³到了這種被戰略家Edward Luttwak所說的「後英雄時代」(Post-Heroic Age)，²⁴過去那種勝利無價的概念幾已蕩然無存，以人力來衡量，勝利不僅要低價，有時低價甚至於凌駕過勝利本身。

後者，持科技決定論，如前文所述，認為是新的軍事科技帶動了後現代戰爭型態的成形，此說為多數後現代戰爭論者所主張。

²¹ Jeremy Black, *War* (London: Continuum, 2001), p. 9.

²² Lawrence Freedman,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ic Affairs*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8), p.15.

²³ Michael Howard, "How much can Technology Change Warfare," in Michael Howard and John F. Guilmartin Jr., *Two Historians in Technology and War* (Pennsylvania: U.S. Army War College, 1994), p.6.

²⁴ Edward Luttwak, "Post Heroic Military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4 (1996), pp.33-44.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兩派之爭實為「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並非無調和的可能。科技變化帶來社會變化，形成與以往不同的社會型態，深刻地改變人類的知識與社會的組織。科技的進步或許並非基於要改良既有的軍事手段，但軍事手段獲得改良卻是每一場科技革命的必然效果。²⁵戰爭的每一部份都受到技術的影響；同樣地，技術的每一部份也都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戰爭。導致戰爭的原（230）因與戰爭進行的目的；開戰戰役的打擊和結束戰爭的勝利；軍隊與社會的關係；計畫、準備、執行和評估；作戰、情報、組織和補給；目標、方法、能力和任務；指揮、領導、戰略和戰術，甚至於我們的頭腦在思考戰爭問題所採取的觀念架構，無一不（直接）受到軍事科技或（間接）受到當時科技所形成的社會條件所影響。²⁶

但另一個爭論顯然就比較難以調和。這些質疑者根本性地挑戰後現代戰爭理論所主張的獨特性，認為根本無後現代性的存在，現代性並未結束，當前的戰爭型態，不過是現代戰爭型態的延伸，充其量為「現代性晚期」（late modernity）的戰爭型態。即便在社會學中，像是Jurgen Habermas、Anthony Giddens或是Ulrich Beck等人固然同意當前大規模的社會轉型確實存在，但他們並不贊同將之稱為後現代性，他們認為當前社會還是有許多現代性的遺緒或甚至延伸，而後現代性要一刀兩斷與現代性割離，實言之過早。甚至有Bruno Latour還認為我們的社會根本都還沒有經歷進入現代性，更遑論後現代性。²⁷

同樣的，當Charles C. Moskos, John Allen Williams and David R. (231) Segal 倡言：冷戰的結束也是現代性戰爭的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後現代性戰爭型態，而相對應的，軍事組織也轉變為後現代性軍隊。²⁸Bradford Booth, Meyer Kestnbaum, and David R. Segal 則指出：當前的軍隊在基本的國土防衛任務上並未全然喪失，並仍保有許多在冷戰時期即存在的意識型態象徵，現代性的傳統在軍隊中還是存在。後現代性所意涵的重大改變並未真正到來。²⁹質疑者也認為：儘管當前戰爭型態所使用的媒介或科技是嶄新的，以網路戰為例，它們打擊的目標還是敵人的指管系統，這並不是什麼新的戰爭態樣，因此並未重新界定戰爭。³⁰後現代戰爭強調媒體對於戰爭型態的影響，即所謂CNN效應。但這也不是新鮮的事，也不是後冷戰時期才出現的獨特現象。早在1964年，當代戰爭研究先驅Quincy Wright便指出：「現代戰爭的趨勢是語言勝過於實體（about words more than about

²⁵ 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mpshire: St. Martin's, 1987), p.19.

²⁶ Martin van Creveld, *Technology and War: From 2000 B.C.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p.311.

²⁷ Wayne Gabardi, *Negotiating Postmoder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 xviii; David Lyon, "Post-modernity," in Gary Browning, Abigail Halcli, and Frank Webster ed.,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ories of the Present* (London: SAGE, 2000), pp. 229-231.

²⁸ Charles C. Mosko, John Allen Williams, and David R. Segal, "Armed Forces after the Cold War," in Charles C. Mosko, John Allen Williams, and David R. Segal ed., *The Postmodern Military: Armed Forc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

²⁹ Bradford Booth, Meyer Kestnbaum, and David R. Segal, "Are Post-Cols War militaries Postmodern?" *Armed Force & Society*, Vol. 27, No. 3 (2001), p. 324.

³⁰ Alexander Moseley, *A Philosophy of War* (New York: Algora, 2002), p. 34.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things)，是可能性、希望或抱負勝過於事實、貪婪或條件。……因此，戰爭依托於現代文明之上，存於複雜的意識型態架構上，並以語言、律法、象徵與價值等諸多教育加以維持。」³¹越戰是第一場「媒體戰爭」，1986年的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在戰術上，北越吃了個大敗仗。但越共與美國憲兵在西貢美國大使館內外的戰鬥、順化城在戰火中淪成廢墟等等鏡頭，透過螢幕傳回美國，大大地震撼美國大眾。北越戰術上的失敗換得戰略面上的成功，它縮短了美國人忍受越戰的時間。在美國媒體一片悲觀報導下，詹森總統宣布不再競選連任。而繼任的尼克森對此的另一個結論是：「媒（232）體是我們最爛的敵人。」³²語雖偏頗，但也顯示出全球最強的國家領導人面對媒體對戰爭的詮釋權力而難以招架的窘狀。這些例子說明了：後現代戰爭理論的後現代性似乎不是獨特的現象，而是現代性的延伸。

更重要的，當比較激進的後現代戰爭認為：軍隊的政治效用（political utility）將產生變化，³³而且國家不一定是擁有發動戰爭控制權的主體，各種為了宗教、種族背景的非政府組織為了各自目的所發動的戰爭將成為新的戰爭型態，³⁴過去以拿破崙時代為背景的Carl von Clausewitz《戰爭論》（*On War*）的論理基礎將不復適用。³⁵此一論點更激起傳統戰略學者的批判，指責這些後現代戰爭理論論者為「只看到少數面向……，缺乏戰略眼光，過度樂觀的簡化論者；」³⁶或是批評後現代戰爭理論只是把現代之前的非民族國家交戰的更「舊」的戰爭重述一次，「無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現今的戰爭」。³⁷Barry D. Watts也指出當今的資訊科技與偵蒐裝備固然能大大地幫助指揮官瞭解所處的環境，但是Clausewitz在理論中再三強調的戰爭之霧或摩擦等現象與概念（233）並不會因此消失。³⁸要言之，傳統的克勞塞維茲派學者批判後現代戰爭論基於錯擬的後現代性而揚棄現代性戰爭典範克勞塞維茲的理論，他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克勞塞維茲對於戰爭本質的看法——諸如機會、戰爭之霧、摩擦等概念——不會有所改變。

完美的戰場與完美的敵人

³¹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4), abridged edition, p. 356.

³² Cited from William M. Hammond, *Reporting Vietnam: Media & Military at War*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8), p.293.

³³ Kenneth F. McKenzie Jr., "Elegant Irrelevance: Fourth Generation Warfare," *Parameter*, Vol. XXIII, No.3 (August, 1993), p.53.

³⁴ Kaldor, *New and Old Wars*, p. 15.

³⁵ 這種對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三位一體」論的否定，以 Martin van Crevel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為代表。

³⁶ David J. Lonsdale, *The Nature of Wa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lausewitzian Future* (London: Frank Cass, 2004), p. 223.

³⁷ Hew Strachan and Andreas Herberg-Rothe, "Introduction," in Hew Strachan and Andreas Herberg-Rothe ed., *Clausewitz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

³⁸ Barry D. Watts, *Clausewitzian Friction and Future Wa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 79.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後現代戰爭理論論者過度樂觀或甚至自我矛盾之處在於：他們相信新的作戰方式——包括達成點穴或斬首效果的以空權為主之遠距精準打擊能力——是後現代戰爭型態下達成戰爭目標的最佳手段，將可取代冗長血腥的地面消耗戰。但此一論點的前提是需要有完美的戰場與完美的敵人配合演出，而這正是美國的敵手或潛在的敵手所極力要避免的。

血腥的消耗戰是現代性戰爭型態的特色固不待言。從1789年到1806年，單在法國境內陣亡的法國官兵就達170萬人。拿破崙的最後一場戰役——滑鐵盧會戰中，48,000名的法軍死傷達25,000人，平均2個法國兵就要倒下1個，而再加上英普聯軍的22,000名死傷，在戰役持續的10個小時間，雙方總共傷亡了47,000名官兵，平均每秒鐘就倒下去1.3名。³⁹工業時代的特色是大量生產，工業時代的戰爭講求大量殺傷，拿這個標準來看，拿破崙時期的戰爭型態——至少在傷亡規模上——確實堪當工業（234）業時代戰爭的前驅。人力消耗的戰爭形式，往往極為血腥，所留下的後遺症甚為嚴重。一次大戰期間，戰爭進行僅1年，俄國即損失100萬兵員。義大利到開戰第二年，傷亡也達到100萬人，除了給對手奧國同樣的傷亡外，可說是毫無收穫。1916年2月凡爾登（Verdun，索穆河戰役的法國版）戰役一開打，10個月內法國士兵損失40萬人，部隊幾乎譁變。⁴⁰

步兵成為戰場主導兵種是造成消耗戰作戰型態興起的主因。不管過去或現在，步兵較之其他兵種，都是比較經濟的兵種；步兵對於昂貴裝備的依賴度與技術面的要求較低，舊式社會可以經由動員，從其人口中大量吸取步兵員額，而這些步兵只要稍加裝備與訓練便可以投入戰場。除經濟面考量外，拿破崙時代之後，步兵在戰場上的效率與騎兵、砲兵相比，越來越居於優勢的地位。同時，砲兵的殺傷力降低也推動步兵成為主導兵種。武器本身在物理上的威力並不必然等於殺傷力，大砲在現代性戰爭期間內幾經改良後，威力雖然日漸增加，但殺傷力卻日益下降。拿破崙時期戰爭、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1856）與墨西哥戰爭（Mexican War, 1846-1848）是砲兵的黃金時期，砲兵的殺傷力在1850年前可以達總殺傷比率的40-50%，比起步兵的輕火器（30-40%）或步騎兵的刀器（15-20%），砲兵的毀滅性效果可說是相當驚人的。然而過了19世紀中葉，砲兵的殺傷效果就大幅下降到只有8-10%。相對的，步槍射程與準度上的改進使（235）得步槍的殺傷力在1860年之後增加到85-90%。⁴¹步兵火器的改良使得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的傷亡統計為例，86%的傷亡是來自於步兵的輕火器所造成的，

³⁹ Alan Forrest, "The Nation in Arms I: The French War," in Charles Townshend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8-63.; Williamson Murray, "Thinking about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Joint Force Quarterly*, Summer, 1997, pp.70-72.; Alfred Vagts, *A History of Militarism: Civilian and Military* (London: Hollis & Carter, 1959), chapter 4 and 5.

⁴⁰ J.F.C. Fuller,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ir Influence on History: Volume Three, From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o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鈕先鍾譯，《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從南北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台北：麥田出版社，民國85年），上冊，頁356、398、389、418。

⁴¹ Trevor N. Dupuy, *Understanding War* (New York: Paragon, 1987), pp.201-203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只有9%傷亡來自於砲擊。⁴²同時，步兵的疏散程度從遠古時期的希臘戰場每10平方公尺有1名士兵，降低到拿破崙時期的每200平方公尺1名士兵與美國內戰時期的每250平方公尺才有1名士兵的比例，而到了第一次大戰機關槍出現後，步兵的隊形更是疏散到每2,500平方公尺才有1名士兵，步兵越疏散，砲擊所能帶來的殺傷就越為有限。到了第二次大戰時，這個比例再增加10倍，到了27,500平方公尺才有1名士兵，到1973年以阿贖罪日戰爭時，這個比例是每40,000平方公尺才有1名士兵，⁴³到了波灣戰爭每426,000平方公里才有1名士兵。⁴⁴這種人員的疏散程度與火力的原始威力的正比例關係反應在戰術層面尤其明顯，當第一枚砲彈落在敵方的戰線上，在殺傷一些敵人的同時，受到攻擊敵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疏散，敵人疏散的結果勢必使得第二枚砲彈的殺傷力要低過於第一枚，第三枚砲彈的殺傷力更要低過第二枚。循環的結果是火力投射的量增加了，殺傷的比例減少了。同時，因為人員疏散的結果，在大部分的情形下，使得戰術上在某一前線所達成的突破經常變得十分的區部化，因為在該點上被擊潰的部隊往往只佔了整個武裝力量的極小部分。⁴⁵在現代性戰爭時期，處理這種矛盾（236）的方式，除了消耗，還是消耗，⁴⁶儘管過了臨界點的彈藥消耗在殺傷力上根本收效極微，但是除了增加火力的投射量外似乎也別無良策。索穆河戰役（1916）與帕斯根第爾戰役（1917）都顯示：面對敵方刻意的疏散與掩護，大規模的砲擊效果除了使戰場變成奶油蛋糕外，還是難有明顯效果。

消耗戰也同樣發生海上與空中。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整個大西洋上真正的海軍艦隊對決其實少見，商船戰才是主要的戰鬥形式，這是一種打擊對方補給物資的消耗戰。空權理論家Giulio Douhet提出戰略轟炸（strategic bombardment）的概念，認為針對敵方後方的非軍事目標進行轟炸，可使敵方迅速屈服。但當時轟炸機的導航能力不足，迷航的事件屢見不鮮；而且就算能夠正確地飛向目標區，日益精確的高射砲火網與敵方戰鬥機所構成的空中防線，均足以對這些速度緩慢的轟炸機群構成巨大威脅；最後，就算是能夠穿透敵方的防線飛抵目標區，轟炸機仍因載彈量有限與缺乏精準轟炸的裝備，無法打擊真正有戰略價值的目標，因此，參戰國所實施的戰略轟炸都無法獲得迅速的戰略效果。例如：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對盟軍德國石化工業區的轟炸中，根據統計，英國皇家空軍9,500公噸的投彈量中有84%是根本就落在目標區外，落進目標區內的只有12.9%，而真正擊中預定目標點煉油生產區的則只有2.2%。美國空軍以風險性大許多的白晝轟炸，但也只有26.8%的投彈量投進目標區內。⁴⁷因（237）此，雖然戰略轟炸是

⁴² Trevor N. Dupuy, *The Evolution of Weapons and Warfare* (London: Jane's, 1980), p.171.

⁴³ Dupuy, *The Evolution of Weapons and Warfare*, p.312.

⁴⁴ 王普豐，《信息戰爭與軍事革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頁153。

⁴⁵ Jones, *The Art of War in the Western World*, p.641.

⁴⁶ John Bourne, "Total War I: The Great War," in Charles Townshend ed.,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odern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6.

⁴⁷ W. H. Parks, "'Precision' and 'Area' Bombing: Who Did Which, and When?" in John Gooch ed., *Air-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Frank Cass, 1995), pp.165-166.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設計來避開僵持與消耗之地面戰鬥而取得勝利的作戰方式，但看轟炸機隊的規模越來越大、次數越來越頻繁，它最後仍然落入消耗戰的邏輯中。⁴⁸

英國戰略家Michael Howard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為「第一類型總體戰」（Total War Mk. 1），但隨著現代科技的進步，機械化與無線電通訊使得野戰部隊重新獲得機動性，空中武力的發展不僅擴大的戰場範圍，更使得在雙方部隊交戰之同時還能大舉摧毀敵方的社會結構與經濟資產，於是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進入了「第二類型總體戰」（Total War Mk. 2）。⁴⁹這兩種類型的總體戰以消耗的性質來講其實相差無幾，但是在消耗的基礎上，前者幾乎全繫於人力資源的基礎上，而後者，則是希望以火力的消耗來取代人力的消耗，如果不能從消耗戰中脫身，至少也要使消耗戰打得比較能夠讓人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人的作戰藝術——除少數例外情況外——都是強調火力的運用以消耗敵方的人力」。⁵⁰這個法則可以一直通用迄今。這種以物資基礎來降低戰爭風險的新消耗戰形式，使得聯軍的將領——像是艾森豪、蒙哥馬利、朱可夫——與其說是偉大的將領（Great Captain），倒不如稱之為軍隊總經理（Military Manager），真正敢冒險的將領——像是巴頓、隆美爾——在大戰中是極少數的例子，而且通常不起太大的作用。⁵¹那些像是德國的裝甲兵團儘管在作戰層次上有令人矚目的表（238）現，但是整個戰爭的勝負還是取決於國家動員後所呈現的總體國力，從這個角度看，第二次大戰與第一次大戰相同，勝利都是靠龐大的消耗所換來的。⁵²到了越戰，就美軍指揮官而言，保存士兵生命，比起戰術勝利重要，因此，指揮官捨冒險而講求安全，火力壓過機動。⁵³即使是波灣戰爭，那也是一場火力大過於機動的戰爭，當聯軍陸上兵力迂迴對伊拉克部隊一翼包圍時，面對的是已被聯軍空中武力轟垮的伊拉克陸軍殘部。⁵⁴波灣戰爭之所以成為一場典範性的勝利，即是能在人員死傷比例極少的情形下達成戰爭目標。

但是以火力的消耗來取代人力的傷亡，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第一項遭遇到的問題是：如同前述，武器的原始威力激增或是其火力投射密度增加之後，迫使受攻擊的部隊進行疏散、掩護以躲避對方武器的殺傷，人員疏散的結果，造成武器的殺傷力降低。第二項問題是附帶損害（correlated damage）的不可避免。武器威力與火力密度的增加固然對於疏散、掩護的敵方部隊的殺傷力降低，但對於非軍事性目標——平民——仍然會帶來難以避免的損害。在戰時，這種附帶損害有

⁴⁸ 參見：陳文政，〈戰略轟炸的理論、應用與限制〉，《國防雜誌》，第11卷，第11期（民國85年5月）。

⁴⁹ Howard, "How much can Technology Change Warfare," p.4.

⁵⁰ G.A. Higgins, "German and US Operational Art: A Contrast in Manoeuvre," *Military Review*, October, 1985, p.23.

⁵¹ Howard, "How much can Technology Change Warfare," pp.4-6.

⁵² Crevel, *Technology and War*, pp.164-165.

⁵³ Robert H. Scales Jr., *Firepower in Limited War* (California: Presidio, 1995), pp.74-82.

⁵⁴ Grant T. Hammond, "Myths of the Gulf War: Some Lessons Not to Learn," *Airpower Journal*, Fall 1998, p.7.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時是雙方交戰所無意造成的。然而，在現代性戰爭中，對於平民目標的大規模傷害是主要出自於總體戰概念下的蓄意破壞，例如：戰略轟炸理論是針對平民目標而來，攻擊者經常會指稱這些目標直接或間接有助於敵方的軍隊，因而正當化對這些非軍事性目標的破壞。二次大戰之後，戰爭法中對平民與軍隊的區別再度抬頭，除非是報復敵方對（239）己方平民的殺傷，西方社會越來越難以容忍他們自己的軍隊對其他國家的人民進行類似戰略轟炸一般的不加區分的殺傷。而從晚近的人道救援與維和行動的幾次例子上看，更是朝向無法容忍其他國家的軍隊對於其他國家的平民的不加區分的殺傷。最後，以火力取代人力的簡單邏輯隨著衝突型態的複雜化也越來越難以適用。首先，在後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在介入人道救援行動與維和行動時，火力的運用受到相當大的限制，不僅交戰規則限定在受到直接的生命威脅時才許開火，而且越來越多的例子顯示在地形不利或者可能會造成附帶損害的情形下，火力運用的可能與其效益越來越低。

美國是舉世最有本錢打消耗戰的國家，也是最常使用消耗戰的國家。但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出兵的考量上減少傷亡的要求往往比起軍事上的勝利來得重要。因此，為了使火力的運用能夠真正降低近接戰鬥所可能會引起的傷亡與附帶傷亡並適應新的衝突型態，遠距精準的火力投射能力成為資訊時代戰爭中所必需，也是從消耗戰邏輯中解套的可能方案。而新的火力運用型態以空軍為始為主，精準導引彈藥（precision-guided munitions, PGM）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問世，使得傳統的砲彈、炸彈逐漸被淘汰，過去那種瞎貓碰死老鼠的空對面攻擊，有了極大的轉變。

美軍在韓戰時期，開始普遍使用導引炸彈來對付橋樑之類的戰略性點目標。⁵⁵1965-1968年「滾雷」（Rolling Thunder）作戰期間，美國空軍出動了700架次戰機去轟炸河內南方70哩處（240）的清化（Thanh Hoa）鐵橋，被擊落了8架也沒能達成任務；1972年「達陣者」（Linebacker）第一階段作戰行動，12架F-4戰轟機再度轟炸清化鐵橋，由於天候因素，攻擊機僅能使用5枚光電導引炸彈進行攻擊，只擊傷鐵橋。半個月美軍捲土重來，14架F-4戰轟機再次進行轟炸，這次使用了15枚雷射導引炸彈，終於擊毀清化鐵橋，而這2次任務，儘管北越防空砲火猛烈，美軍軍機無一傷亡。⁵⁶福克蘭戰爭（Falklands War, 1982），阿根廷空軍只有5枚空射型飛魚飛彈（Exocet），但出擊3次，就分別擊沉了英國特遣艦隊二艘船，包括19,000噸級運輸艦大西洋運輸號（*Atlantic Conveyor*）與4,000噸級巡防艦雪菲爾號（HMS *Sheffield*），由於飛魚飛彈40%的命中率與一旦被擊中後的100%的擊沉率，英國海軍一直要到確知阿根廷5枚空射型飛魚飛彈都用掉了，才敢放心讓主力艦隻進入福克蘭島近岸水域。若是戰前阿根廷多買了幾枚這種飛

⁵⁵ Richard P. Hallion, "Precision Air Attack in the Modern Era," in Richard P. Hallion ed., *Air Power Confront an Unstable World* (London: Brassey's, 1997), p.117.

⁵⁶ John Keegan and Richard Holmes, *Soldier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Men in Battle* (New York: Konecky & Konecky, 1985), p.197.; John Pimlott, *Vietnam Decisive Battles* (New York: Barnes & Nobles, 1990), pp.172-174.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彈，或許戰爭就不是以原來的方​​式結束。⁵⁷波灣戰爭中，1架F-117轟炸機出動1次扔1枚炸彈的效果，抵得上二次大戰時B-17轟炸機出動4,500架次、扔9,000枚炸彈的效果，或是越戰時出動95架次、扔190枚炸彈的效果。在波灣戰爭中，6週內共使用了17,000枚精準導引彈藥（包括了9,000餘枚雷射導引炸彈，5,000餘枚空對地飛彈，2,000餘枚反輻射飛彈與333枚巡弋飛彈），單單雷射導引炸彈的使用量就是越戰時期長達9個月的空襲北越行動的兩倍。雖然在比例上佔不到5%的精準導引彈藥，卻摧毀了75%伊拉克重要的戰略與作戰（241）目標。但不可否認的，波灣戰爭同時也使用了21萬枚傳統炸彈（佔95%強的比例）。⁵⁸因此，遠距精準武力在波灣戰爭的運用密度雖高，但才只是個開始，在整體火力上所佔比例仍然有限。1995年，北約介入波士尼亞內戰，與波灣戰爭不同，在這次命名為謹慎武力（Deliberate Force）的軍事行動中，為了嚇阻塞爾維亞人的行動，北約部隊大量使用精準導引彈藥，而且專打塞爾維亞人指揮管制中心、運補線、野戰部隊與空防系統。以美軍為例，在這次行動中，計使用了622枚精準導引彈藥與僅僅12枚傳統炸彈，美國以外的國家使用精準導引彈藥的比例較低，計使用了86枚精準導引彈藥與306枚傳統炸彈，平均起來，在95年的謹慎武力行動中，盟軍使用精準導引彈藥的比例達69%，約為波灣戰爭時的12倍。在針對重要目標的700架次空中任務中，可達成完全摧毀既定目標的比例達67%，可達成重創目標的比例為14%，僅能造成目標輕微損傷的有16%，只有3%是完全打不到目標。⁵⁹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由傳統炸彈改裝的聯合直攻武器（joint direct attack munition, JDAM）的使用量大增，成為該場戰爭中使用次多（5086枚）的精準武器，聯合直攻武器遠較雷射導引武器價廉，效果相近，在阿富汗戰爭中所投擲的7200枚精準彈藥中也佔4600枚之多，將成為美軍未來精準彈藥的主力。⁶⁰（242）

這種以精準導引彈藥為基礎的精準交戰能力（precision engagement），重新定義了戰略轟炸的概念，新的「戰略攻擊」（strategic strike，外科手術性攻擊可以說是它的俗稱）的觀念逐漸興起，舊的戰略轟炸是大規模空襲平民目標，新的戰略攻擊則是「以獨有的空中與太空能力，打擊敵人心臟，破壞重要的指揮管制系統與支持戰爭的能力，並避免需再動用地面部隊來攻進目標。」⁶¹戰略攻擊的概念雖在打擊的目標與打擊的手段上與傳統的戰略轟炸有所不同，但是的目的上，還是反映了同一件事：希望跳出地面部隊血腥的消耗戰，藉由打擊敵人的戰略重心，以點穴或斬首的方式，以空中的力量迅速地達成決定性的戰果。

⁵⁷ Max Hastings and Simon Jenkins, *The Battle for Falklands* (London: Book Club, 1983), p.319

⁵⁸ Hallion, "Precision Air Attack in the Modern Era," pp.119-120.; Thomas A. Keaney and Eliot A. Cohen, *Revolution in Warfare? Air Power in the Persian Gulf*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5), pp.191-192, 203.

⁵⁹ Hallion, "Precision Air Attack in the Modern Era," pp.121-122.

⁶⁰ Anthony H. Cordesman, *The Iraq War: Strategy, Tactics, and Military Lesson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3), p. 295.

⁶¹ USAF, *Strategic Attack* (Air Force Doctrine 2-1.2), p.21.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然而，就威脅來源言，現代戰爭時期的威脅來源是來自於同類型的敵對國家（peer challenger），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法與德、奧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美、俄與德、日，這些國家間雖然有發展與文化上的差異，但基本上作戰的方式具有可預測的相似性。但後現代戰爭理論論者指出：在後現代戰爭時期美國主要的威脅乃來自於不對稱的威脅，所謂不對稱，乃「與對手不同的行動、組織或思考以極大已之優勢、利用敵之弱點、掌握機先或取得更大之行動自由。不對稱戰爭型態可能是政治戰略性的、軍事戰略性的、作戰面的或以上諸項的組合。不對稱戰爭需要不同的方法、技術、價值、組織、時間感或以上諸項的組合。」⁶²不對稱戰法具有趨弱避強的特質，就現代觀點而言，主要乃指非傳統或非正規的作戰方式。⁶³不對稱戰法是對稱（243）（symmetric）戰法的相反，所謂對稱戰法，在美軍的觀點中是指相同類型的武力間的交戰，因此交戰的結果將取決於數量、訓練、領導與科技的優勢，不對稱戰法則為不同類型武力間的交戰。⁶⁴科技的因素是西方國家戰略思維中的重要因素，美國在軍事科技上的領先使得潛在的對手很難能夠在那種美國式的科技消耗戰爭中挑戰美國。因此，對美國的不對稱戰法就是不以美國所擅長的科技消耗作戰方式與美國交戰。越戰與波灣戰爭是兩種不同典型，越戰中，越共或北越的游擊戰法能夠在叢林中逐漸消耗美軍的科技優勢，但只要越共或北越對美軍陣地進行大規模的正規攻擊（如溪山圍攻），美軍憑藉科技所享有的優勢就會再度顯現出來。波灣戰爭中伊拉克最大的軍事失誤，就是妄想在那種美軍所擅長的作戰方式與地形中，好整以暇地與美軍交戰。這兩個例子，會讓美國人的潛在對手學會：不要用美國人所擅長的作戰方式與美國人戰爭。

更令人矚目的，當交戰兩造所爭的利益不是具體的土地，而是難以計量的道德價值時，比如民主、人權等等，對這些抽象價值的價值認定因為文化、宗教、政治型態等的歧異所會使得不對稱性還要乘數估算。在這種衝突中，衝突的目標幾乎完全於土地的爭奪無關，因此軍事概念下的佔領與攻守概念很難適用。敵人是誰？有時也不是很清楚，甚至在某些例子中，是沒有敵人或不能製造敵人。學者甚至指出：後冷戰軍隊建軍備戰的最主要障礙是尋求敵人，而在後英雄時代的戰爭型態中，戰爭不僅是社會（244）變遷的反應，更是後現代政治現實的反應，而這個後現代的現實就是我們處在一個「沒有敵人」的社會。⁶⁵後冷戰時期，當持著特定理念或價值的美軍進入係爭地區時，無論這個的價值是維持當地秩序、人道救援、和平維持或其他高尚理由，總是會與當地勢力的利益不相對稱，並免

⁶² Steven Metz and Douglas Johnson, *Asymmetry and U.S. Military Strategy* (Carlisle: U.S. Army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1), p. 5.

⁶³ Charles J. Dunlap, Jr.,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Asymmetrical Warfare and Western Mindset," in Lloyd J. Matthews ed., *Challenging the United States Symmetrically and Asymmetrically: Can America be Defeated?* (Pennsylvania: U.S. Army War College, 1998), p.1.

⁶⁴ Freedman,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ic Affairs*, p.40.

⁶⁵ Christopher Coker, "Post-Modern War," *RUSI Journal*, June, 1998, p.13.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不了當地民眾以其介入主權國家內政或以西方價值強加於人的敵對意識。在這樣的環境中，武力的行使受到極大的限制，西方的軍隊經常只能扮演坐著裝甲車的義警。1992年3月間，14,000名聯合國維和部隊進入波士尼亞（Bosnia-Herzegovina）來隔離克羅埃西亞（Croatia）與賽爾維亞（Serb）部隊。但當他們進入波士尼亞後，才知道要制止賽爾維亞人對回教徒進行的種族清除是非常困難的任務。維和部隊除了要留意自己安全之外，在裝聾作啞外，心理更蒙受沈重的道德壓力，整個維和行動不了了之。⁶⁶到了1999年，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轟炸行動中，北約儘管可以精準導引彈藥痛炸貝爾戈勒（Belgrade），但北約飛行員在15,000英尺高空透過電腦化的目標顯微系統仍然清楚地看見地面上的賽爾維亞人照樣在燒回教徒的房子。⁶⁷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先後用兵阿富汗與伊拉克。在對付伊拉克正規軍這種完美的同類型敵人時，在曠野的完美戰場裡美軍的優勢得以完全發揮。但是當在阿富汗的崇山峻嶺的不完美戰場中，又碰上不完美的阿富汗非正規軍時，美軍還是得由步兵進行傳統的消耗戰，而當伊拉克的正規軍（245）屈服了後，美軍還是得由步兵擔任綏靖的任務，同樣消耗。這兩場消耗戰事，還是得由地面部隊處理，消耗無法速決，成為小布希政府第二任任期極大的戰略負擔。而且，美軍面對的是不懼死亡的宗教狂熱份子，於是舊傳統的消耗戰新上場，「反恐戰爭本身就是消耗戰，如果一個宗教狂熱恐怖份子沒有被擊殺或監禁，那他一定會想盡辦法來試圖殺你或破壞你的文明。」一個退役的陸軍軍官在美國陸軍戰院的官方刊物如此寫著，「除了讓敵人流盡鮮血外，沒有替代方案。」⁶⁸

結論

美國國防分析家Carl H. Builder曾中肯地說：美軍的軍事戰略主要針對「他們準備想到打的戰爭型態」，而不是「真正會遇到的戰爭型態」。⁶⁹事實上，這種現象也不是美國所獨有，特殊的社經背景、不同的歷史經驗與分歧的軍種利益，都可能造成這種現象。法國人在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空等不會來的德軍攻擊，直到法國淪陷；英國人在新加坡準備給海上的日軍船艦迎頭痛擊，直到日本陸軍從後方一路撲來。有戰略論述支撐的國防軍事政策有利有弊，好的是，施政在一套哲學之上，有理則可循；壞的是，政權更易可以改變政策，但要撼動一套既定的戰略論述則非常困難。

前述對後現代戰爭理論兩個面向的批判，雖未能窮究所有的質疑，但至少針

⁶⁶ Laura Sibber and Allan Little, *The Death of Yugoslavia* (London: Penguin, 1996), chapter 18.

⁶⁷ Ignatieff, *Virtual War*, p.105.

⁶⁸ Ralph Peters, "In Praise of Attrition," *Parameters*, Vol. XXXIV, No. 2 (2004), p. 26.

⁶⁹ Carl H. Builder, *The Mask of War: American Military Styles in Strategy and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27.

發表於淡江大學主辦，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第四屆學術研討會（台北，2011年6月）。收錄於翁明賢主編，《論辯與融合：解析國關理論與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11年），頁223-247。

對美軍軍力轉型背後的戰略論述提出不同的看（246）法。這些正反爭論如同後現代戰爭理論的發展一樣，在美國人的自信與矛盾的衝突情結中，也持續了20餘年。當美國總統跟他的核心官員能安逸地坐在白宮戰情室觀賞擊殺恐怖份子的越洋即時視訊時，還有數以萬計的美國士兵要遙遠的山谷進行「骯髒、老式的戰爭」（dirty old war），這種對比真能突顯此種衝突情結。

美式的軍事事務革命或軍事轉型擴散的很快，但許多國家很快發現既無社經基礎以支撐這種壯舉，也不覺得有此必要。發展地方特色的軍事事務革命，或者（對那些想與美國作對的國家）發展針對美國的不對稱戰力，更是知易行難。從美國在後現代戰爭理論的發展與爭論中，吾人最大的啟示或許是：戰略論述離不開對於母體社會條件的先行分析與敵情威脅的透測瞭解，並且能夠從實踐中吸取改進的線索。而這些，台灣都匱乏。（247）